南唐烈祖的個性與文藝活動

陳葆真
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

一、南唐簡史——由盛而衰的國勢

南唐自烈祖李昇於後晉天福二年（937）代吳（902～937）自立，到宋太祖開寶八年（975）十二月亡國，期間共經三主：烈祖（937～943），中主（943～961），和後主（961～975），享國三十九年。相較於兵火連年的北方中原，南唐偏安江左，得天獨厚。烈祖建國之初，以金陵爲國都，廣陵爲東都，領土包括了江北十四州和江南十九州。所轄領域主要爲今日的江蘇、湖北、安徽、和江西等富庶之區。江北十四州，主要是以廣陵（今揚州）爲中心的蘇淮地區。廣陵自隋煬帝開鑿運河，聯絡南北交通後，歷經唐代的經營，已經發展成爲長江以北最重要的商業及軍事重鎮，控扼運河糧運及南北交通的樞紐；而沿海地區又富有漁、鹽之利，尤其是鹽產，更爲當時主要的民生必需品。至於江南十九州，主要是以都城金陵（今南京）爲中心的江蘇、安徽、和江西地區。這些地區位居長江下游，土壤肥沃，爲漁米之鄉，因此，民生富裕，文風鼎盛。金陵爲六朝故都，天然形勢壯麗雄奇，人文薈萃，史蹟更是豐富。烈祖在此建都，金陵便成爲南唐的政治、經濟、和文化中心。烈祖年號昇元，在位七年（937～943）。當他壯年（56歲）而薨之時，南唐可稱是當時全中國最安定而富庶的地方。它的國力充沛，府庫充實。烈祖臨終時，勸誡中主：「德昌宮儲戎器金帛七百萬，汝守成業，宜善交鄰國，以保社稷……。」① 當時他心中所唯一掛慮的是來自北方的威脅，因此又警告中主說：「北方有事，不可忽也。」②

---

① 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四部叢刊本（臺北：商務印書館），卷1，烈祖本傳，頁8；又同樣資料見於龍袞，《江南野史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（臺北：商務印書館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，1983），冊464，頁73。

② 陳彭年，《江南別錄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，冊464，頁124。類似用語又見於無名氏，《釣磯立談》，四庫全書，冊464，頁53。

中主（李璟）年號有保大、中興、交泰，後奉周、宋正朔，在位共十九年（943～961）。③ 他曾經野心勃勃，一度向南北伸張勢力，有一統中國之志。在南進方面，他曾於即位後第三年(保大三年，945)派馮延魯和陳覺率軍攻下閩國所屬的福建建州，迫降汀州和泉州，在那兒設置永安軍。④ 二年後（947）由於吳越派軍助閩，唐兵大潰，不得已才撤軍，但烈祖遺留下來的財富也因此而消耗殆盡⑤ 。但中主仍野心不減，再西向滅楚，得到勝利。⑥ 在面對中原方面，中主曾一度想結盟契丹，入主中原，但因契丹不肯而作罷。⑦ 然而，他在北進的工作上，卻遭遇到很大的挫折。從保大十二年（後周顯德元年，954）到交泰元年（後周顯德五年，958）的四年之間，他幾度與後周交兵，結果慘敗。爲此，他付出了極大的代價：不僅割讓所有江北十四州的領土給後周，入貢稱臣，並且去國號，改稱國主，奉周正朔。⑧ 北宋建國後第二年（961），中主更害怕北兵渡江來犯，於是遷都到洪州（南昌），但不久便悒鬱而卒。

後主（李煜）即位金陵，奉宋正朔，沒有年號，在位共十五年（961～975）。這時的南唐，已失去了原有國土的一半，經濟實力大受打擊，連民生必須品的鹽，也因失去江北諸州，而得依靠北方的後周和宋朝，年年限制性的供給三十萬噸，以維持生活所需。又由於長年對後周和宋朝納貢，致使國庫匱乏。⑨ 原來使用的銅錢大量流失，無力再鑄，只好兩度改鑄鐵錢，

③ 保大共十五年：943～957；中興和交泰元年爲958；奉周年號：顯德五年～六年，958～959；奉宋年號：建隆元年～二年，960～961。

④ 見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校印本，1969），冊15，卷285，後晉齊王開運二年（945）事，頁9296～9297。

⑤ 見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，冊15，卷286，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（947）事，頁9349～50。

⑥ 見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，冊16，卷290，後周太祖廣順元年（951）事，頁9467～9472。

⑦ 見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，冊15，卷286，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（947）事，頁9338；又見同書，冊16，卷292，後周世宗顯德元年（954）事，頁9532；卷293，後周世宗顯德三年（956）事，頁9541，9562。

⑧ 見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，冊16，卷292，後周世宗顯德元年（954）～卷294，顯德五年（958）事，頁9534～9583。

⑨ 南唐缺鹽事，參見馬令《南唐書》，四部叢刊本，卷4，〈嗣主書〉，頁20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卷2，頁13～14。又，參見竺沙雅章，《獨裁君主の登場－宋の太祖と太宗》（東京：清水書院，1984），頁121。南唐入貢後周及北宋事例，見無名氏，《南唐史》，收入清代稿本百種彙刊（臺北：文海書局，無出版年月），〈兩朝事大〉條，頁111～135。

幣值因而大貶。⑩ 經濟凋敝的結果，朝廷只好加重稅捐，所謂「民間鵝生雙子，柳條結絮皆稅之。」此時江南的重稅，比起它的前身吳國統治時，加重了好幾倍。⑪ 於是，原本富庶的漁米之鄉，在偶而欠收的年歲中，竟然也會因積糧不足而導致大飢荒，甚至要靠北方敵對的宋朝來救濟。⑫ 更可悲的是，連戰鬥用的馬匹，也得靠敵對的宋朝賜予。⑬ 南唐的國防戰備，除了水軍之外，根本無法與宋人對抗。從烈祖建國到後主在位，短短的三十多年之間，南唐國勢的由盛而衰，變化之大，實在令人惋歎！

後主在位的十五年中，完全採取忍辱求生的態度來侍候北方的宋朝，比如去國號，向宋稱臣，奉宋年號，降官爵、制度，以地方政權自居，經常派諸王重臣入貢、朝賀、請安等等。他對於宋朝的反應更是戰戰兢兢，惟恐得罪。最明顯的是，每逢宋使要到金陵前，後主便下令取下宮殿屋頂上的鴟吻，不敢顯示廟堂的尊嚴，而他自己也換下帝服，改穿紫袍迎接，宋使離去後，才敢復原。⑭ 但這些謹言慎行都不足以息事寧人，更不足以按捺宋太祖統一中國的雄心。宋開寶七年（974），太祖命後主到汴京參與祭天的柴燎之禮。後主知道如果前去便會被扣押，因此，稱病不奉詔。⑮ 這給了宋朝出兵懲罰的藉口。同年九月，太祖派大將曹彬和潘美率水軍下長江直逼金陵，同時又邀位於江浙的吳越出兵夾擊南唐。後主二度派徐鉉入汴求太祖緩兵。⑯ 徐鉉力辯南唐事宋殷勤，毫無過失。但宋太祖乾脆回答：「不須多言，江南亦有何罪？但天下一家，卧榻之側，豈容他人鼾睡?!」⑰ 表示無理可喻，志在必得的決心。開寶八年（975）十一月，金陵終被攻陷，後主自殺未遂，出城降宋，南唐亡。開寶九年（976）正月，後主與后妃、宗室及降臣共四十五人抵汴京，太祖封爲違命侯，授左千牛衛上將軍。⑱ 同年

⑩ 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卷3，〈後主本紀〉，頁16；又參見畢沅，《續資治通鑑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重印，1962），卷3，宋乾德元年（963），頁76。

⑪ 見曾敏行，《獨醒雜志》，（楊萬里淳熙乙巳1185年序），四庫全書，冊1039，卷1，頁527。

⑫ 見畢沅，《續資治通鑑》，卷5，乾德五年（967）事，頁112。

⑬ 見曾敏行，《獨醒雜志》，頁529～530。

⑭ 參見陳彭年，《江南別錄》，頁127；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5，頁22；陸游《南唐書》，卷3，頁16～17。

⑮ 同上註。

⑯ 見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23，頁95。

⑰ 太祖回徐鉉的這段話，不見於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而見於王稱，《東都事略》（臺北：中央圖書館重印，1990），冊1，卷23，李煜傳，頁402。

⑱ 陳彭年，《江南別錄》，頁128，龍袞，《江南野史》，卷3，頁84；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3，頁26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卷3，頁18；王稱，《東都事略》，冊1，卷23，頁403。

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

十月，太祖駕崩，太宗即位，十二月即改年號爲太平興國元年，改封後主爲隴西公。太平興國三年（978）七月七日，太宗遣人祝賀後主四十二歲生日，賜酒，以牽機藥酖殺後主，葬之於洛陽北邙山，並追封爲吳王。南唐舊臣徐鉉奉太宗之命爲後主寫了墓誌銘。⑲

南唐雖因武力不敵而亡於宋兵之手，南唐舊臣也隨之仕宋；但是他們對於故國之亡，只是歸於天命氣數，對於後主之失國，毫無怨懟之詞。當後主死訊傳到金陵之時，百姓痛哭，並爲他設奠遙祭，尊爲仁主。這可見民心之所向，更可看出南唐三主勤政愛民的治績。⑳

南唐享國只有三十九年，然而文化建設之盛凌駕於各國之上，其中包括：貢舉、書院、和人才的延攬，這是史家一致公認的。先以貢舉爲例：當代史家陳彭年明白指出：

> 烈祖初立，庶事草創，未有貢舉。至元宗始議興置。時韓熙載、徐鉉兄弟爲當代文宗，繼以潘佑、張洎以才名顯。後主尤好儒學，故江左三十年文物有貞元、元和之風。㉑

其次再看書院的設立，以廬山的白鹿洞書院爲代表，根據畢沅的記載：

> 白鹿洞在廬山之陽，常聚生徒數百人，江南李後主時，割善田數十，歲取其租廩給之。選太學通經者，授以他官，俾領洞事，日與諸生講誦。……㉒

根據文獻記載，當時隱居在廬山一帶的儒者很多，包括劉洞、江爲、陳貺、史虛白、伍喬、許堅、毛炳、和鄭元素等人，而白鹿洞便成爲學者活動的中心。㉓ 因此，後主更特別撥調官田租稅以充當書院的經費。㉔

當時南唐朝中，不但包括江南本地的文臣，而且也有中原來奔的儒臣，

⑲ 銘文見徐鉉，《騎省集》，四庫全書，册1085，卷29，〈大宋左千牛衛上將軍追封吳王隴西公墓志銘并序〉，頁221～223。

⑳ 參見陳彭年，《江南別錄》，頁128～129；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5，頁26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卷3，頁18。

㉑ 陳彭年，《江南別錄》，頁127。

㉒ 畢沅，《續資治通鑑》，卷9，太平興國五年（980）事，頁250。

㉓ 參見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13～15，〈儒者傳〉及〈隱者傳〉，頁56～66。

㉔ 關於南唐的學校和貢舉，參見無名氏，《南唐史》中的專論，頁181～196。

其中最有名的是韓熙載。㉕ 這些文人的南奔，主要是要逃避北方連年的戰亂，到富庶安定的南方，尋求一展長才的機會。南北人才的薈萃，更推動了南唐文化活動，致使南唐文風鼎盛一時，連契丹和高麗等外族都慕名來貢，把它當作是大唐帝國文化的沿續。這種情形馬令在他的《南唐書》，〈儒者傳〉序言中說得很清楚：

> ……五代之亂也，禮樂崩壞，文獻俱亡，而儒衣書服，盛於南唐，豈斯文之未喪，而天將有所寓歟?!不然則聖王之大典掃地盡矣。南唐累世好儒，而儒者之盛，見於載籍，燦然可觀。如韓熙載之不羈，江文蔚之高才，徐鍇之典贍，高越之華藻，潘佑之清逸，皆能擅價於一時，而徐鉉、湯悅、張洎之徒，又足以爭名於天下。其餘落落不可勝數。故曰：江左三十年間文物，有元和之風，豈虛言乎?!㉖

而元代學者趙世延在爲陸游的《南唐書》刊行序言中也明白指出：

> ……（南唐）雖爲國褊小，觀其文物，當時諸國莫與之並。其賢才碩輔固不逮蜀漢武侯，而張延翰、劉仁贍、潘佑、韓熙載、孫忌、徐鍇之徒，文武才業，忠節聲華，炳耀一時，有不可揜矣。其間政化得失，興衰治亂之蹟，有可爲世鑒戒者，尤不可泯也。竊謂唐末契丹雄盛，虎視中原，晉漢之君，以臣子事之惟謹，顧乃獨拳拳於江淮小國，聘使不絕，嘗獻橐駝，拜羊馬千計。高麗亦歲貢方物，意者久服唐之恩信，尊唐餘風，以唐爲猶未亡也邪?!㉗

這些文化上的成就，實應歸功於南唐三主本身的文藝修養，以及他們對文化建設的重視。以下，我將從當時的時代背景中，分別探討烈祖、中主、和後主三人的個性，文藝修養，和在他們的領導下，南唐文藝發展的情形。由於篇幅所限，本篇先論烈祖，至於中主和後主的部份，則將在他篇中討論。

㉕ 韓熙載傳記資料，參見徐鉉，〈唐故中書侍郎光政殿學士承旨昌黎韓公墓誌銘〉，收於《騎省集》，卷16，頁122～124；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13，頁56～57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卷9，頁55～57。

㉖ 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13，〈儒者傳〉序言，頁56。又，《釣磯立談》頁57中也有類似記載：「當是時，天下瓜裂，中國衣冠多依齊台，以故江南稱爲文物最盛處……」。

㉗ 趙延世，〈南唐書序〉，見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頁1。

臺灣大學藝術 期刊資料庫

二、烈祖的個性特色

烈祖本名李昇，原爲徐州李榮之孫，父李志早卒。㉘ 唐昭宗乾寧二年（895），李昇八歲，當時以楊州爲據點的楊行密攻下濠州，見烈祖相貌不凡，取以爲養子，但爲行密長子楊渥所不容，因此，改由行密部將徐溫收養，改名爲徐知誥。但又有一說以爲：「（烈祖）孤，有姨出家爲尼，出入徐溫宅，與溫妻李氏同姓，帝亦隨姨往來。溫妻以其同宗，憐其明慧，收爲養子。」㉙ 唐昭宗天復二年（902），楊行密自立爲王（902～905），建都廣陵，國號吳，後來傳位給他的三個兒子：楊渥（905～908）、楊隆演（908～920）、及楊溥（920～937）。徐溫爲重將，出鎮金陵。徐知誥長大後，「身長七尺，廣顙隆準，精彩鑠人」，而且「姿貌瑰特，目瞬如電，語音厚重，望之懾人，與語可愛」，㉚ 又以才幹和謀略都超越徐溫諸子，而受重用：先受命守潤州（909年），後轉鎮廣陵（918年），楊隆演時拜左僕射（919年），楊溥時，又拜爲侍中（926年）。而當徐溫過世（927年）後，他的地位更爲重要，實掌吳國大權。又因爲他的次子景遷爲吳王女婿，而女兒則嫁給吳王之子楊璉爲妻（937年），這樣與王室聯姻的結果，更鞏固了他的政治地位。後晉天福二年（937）他終於代吳自立，建都金陵，國號唐，尊養父徐溫爲義祖，遷吳王楊溥爲讓皇。兩年後（939），他恢復了本姓李名昇，並將他的譜系追溯到唐朝玄宗時信安王李禕的祖父吳王之後。㉛ 這些措施，表明了他以承繼唐朝政權爲職志的雄心。

一個人的成敗和命運，與他的個性息息相關。以我的觀察，烈祖個性的特色，可歸納爲三點：長於謀略、節儉勤政、愛好文藝。因爲這些特點，使

㉘ 關於烈祖的出身，有兩種說法：一般都說他是江蘇徐州人，如鄭文寶，龍袞，馬令，陸游，司馬光等人，見前揭書，但另一說，以爲他是湖州安吉人，本姓潘，見《吳越備史》；又有後人懷疑他本不姓李，是爲冒唐朝王室之後才冒姓李等等，詳見夏承燾，《南唐二主年譜》（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74重印），頁1～2。此處延用鄭文寶，《江表志》，四庫全書，冊464，卷1，頁132所記。因鄭文寶爲南唐舊臣，對於史實應較明瞭。

㉙ 這兩種說法分別見於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，冊14，卷260，頁8467；和鄭文寶，《江表志》，卷1，頁132。

㉚ 前者見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1，頁6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卷1，頁4；後者見龍袞，《江南野史》，卷1，頁70及73。

㉛ 關於烈祖發展的這段歷史參見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，冊14，卷260，頁8467～冊15，卷282，頁9199。景遷爲吳王婿，事見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7，頁33，又見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列傳卷13，頁74。

他崛起於亂世，代吳自立，建立南唐。而勤於治國和崇尚文儒的結果，吸引了大批文士群集，使南唐文藝發展爲各國之冠。以下，我將舉相關史實來說明我的論點。

1. 烈祖的長於謀略

由於烈祖的長於謀略，才能在亂離的際遇中，脫穎而出，成就大業。他本是個八歲失怙的棄兒，在兵馬倥傯之中，輾轉被人收養。在養家兄弟的嫉妒裡，任勞任怨，力爭上游，發展才幹，獲得重用，終而代吳自立。他的個性具有多面性，既富於情感，同時又重於理智。首先我們可以從他對養父徐溫的孝行裡，看到他個性中溫婉淳厚的一面。根據陳彭年的《江南別錄》：

> 烈祖奉義祖以孝聞。嘗從義祖征伐，有不如意，杖而逐之。及歸，拜迎門外。義祖驚曰：『爾在此邪？』烈祖泣曰：『爲人子者，舍父母何適？父怒而歸，母子之常也。』義祖由是益憐惜。㉜

而龍袞的《江南野史》，對於烈祖對義祖的孝行，更有歷歷如繪的描述：

> 先主雖少，而天性頴悟，夙敦子道。朝夕起居，溫清左右，承顏侍膳。……。及遇溫戚屬，皆能俯躬迎奉。溫婦見之而頗鍾愛，撫養無異……知誥既長，溫爲娶，其婦亦能奉蘋藻，致柔順之美。溫嘗卧疾，唯先主躬侍左右。至於糞溺皆親執器，動至連月。踰時扶掖出入，或通霄達曙，曾不解帶。或夜聞聲欬聲，乃率婦同往者數四。……溫見其篤於孝養，而復能幹家，知非常品，而諸子難及……溫凡出征討，而疑其帳下，故先主常得奉侍，遂習熟武事，因能騎射，起家爲偏將……㉝

由以上諸例，可以得知烈祖在徐家成長的過程，以及由於他的孝行，而得到徐溫全力的培植和信賴。

另外，則是他剛烈的一面。鄭文寶在《江表志》中，一再提到「烈祖性多嚴忌」。當他對下屬不信任時，也會用嚴刑：「以竹籠乘之，沈於江

㉜ 陳彭年，《江南別錄》，頁123。

㉝ 龍袞，《江南野史》，卷1，頁70～71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口。」而當他震怒時，更是雷霆萬鈞，無人敢犯：「烈祖矜嚴峻整，有難犯之色。常怒作數聲，金鋪振動……」。㉞ 晚年他又因服食金石丹藥，而助長這種急燥剛烈的脾氣，最後終於因此而暴斃。㉟ 烈祖雖因長期歷經艱困環境的磨鍊，而形成暴燥的個性，但是，他總是極力以理性予以克制，因此，仍是一個個性剛烈的明君。司馬光對於他的一些善政仍是相當肯定的：

> 自烈祖相吳，禁壓良爲賤，令買奴婢者，通官作券。㊱

> 唐主自爲吳相，興利除害，變更舊法甚多。及即位，命法官及尚書刪定爲《界元錄》三十卷。㊲

> 唐主嘗夢吞靈丹，旦而方士史守沖獻丹方，以爲神而餌之，浸成躁急，左右諫，不聽……群臣奏事，往往暴怒，然或有正色論辯中理者，亦欽容慰謝而從之。㊳

烈祖的長於謀略也是史書明言的事實。鄭文寶的《江表志》說：「帝沈幾遠略，莫知其際。」㊴ 這種個性原是他從小爲了應付徐家諸子對他的欺凌，而漸漸發展出來的本事。徐家諸子中以三郎徐知訓對他最爲惡劣。據陳彭年的《江南別錄》：

> 義祖以己子既弗克負荷，用烈祖猶愈於他人。因留輔政。先是，知訓待烈祖甚悖，每呼爲乞子。與諸弟夜飲，遣召烈祖。烈祖不至，知訓怒曰：『不喫酒，喫劍乎？』餘皆類此……㊵

對於知訓的欺侮，烈祖始終忍耐，不與他正面衝突，但求伺機報復。只可惜知訓先他而死。㊶ 後來當徐溫過世，他武功日盛，執吳國大權時，便

㉞ 見鄭文寶，《江表志》，卷1，頁134。
㉟ 陳彭年，《江南別錄》，頁124；鄭文寶，《江表志》，卷2，頁134；又見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，冊15，卷283，頁9245。
㊱ 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，冊15，卷283，頁9246。
㊲ 同上註，頁9240。
㊳ 同上註，頁9244。關於史守沖傳，見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列傳14，頁80。
㊴ 鄭文寶，《江表志》，卷1，頁132。
㊵ 陳彭年，《江南別錄》，頁123。
㊶ 同上註。

回過頭來，想法酖殺徐家另一個兄弟徐知詢，手法相當狠毒。㊷

烈祖的長於謀略，使他從一個失怙的孤兒，崛起於兵火之間，成爲南唐的開國君主，可算是亂世英雄。以下，我據《資治通鑑》所載，集成他的生平大事記，以見他的創業經過：

南唐烈祖大事年表

（據《資治通鑑》冊14，15，卷260～283，頁8467～9256）

895	唐昭宗乾寧二年	李昇八歲。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攻濠州，得之爲養子。後轉由徐溫收養，改名爲徐知誥。（冊14，卷260，頁8467。）有關知誥八歲至二十二歲（895～909）之間，隨徐溫轉戰征伐事，見卷260～267，頁8476～7；8484；8485～6；8492；8502；8509～11；8520～22；8543；8557；8573。
902	唐昭宗天復二年	唐封楊行密爲吳王（902～905），都廣陵。（卷265，頁8573。）
905	唐哀帝天祐二年	楊行密薨，子楊渥繼位。（卷265，頁8652。）
908	後梁太祖開平二年	楊渥卒，弟隆演繼位。（卷266，頁8698。）
909	後梁太祖開平三年	徐溫治金陵，徐知誥治潤州。（卷267，頁8708。）
918	後梁末帝貞明四年	知誥至廣陵，平朱瑾之亂，代知訓執吳大政，士民歸心。（卷270，頁8831。）
919	後梁末帝貞明五年	楊隆演卒，行密幼子溥即吳國王位。知誥爲左僕射。徐溫爲大丞相。（卷270，頁8843～44。）
920	後梁末帝貞明六年	①徐溫父子專政。（冊15，卷271，頁8855。） ②吳修金陵城。（卷271，頁8860。）

㊷ 參見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，冊14，卷276，頁9036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926　後唐明宗天成元年　①徐知誥爲侍中。
（卷274，頁8971。）
②後唐青州專使北海韓叔嗣之子韓熙載奔吳。
（卷274，頁8992。）

927　後唐明宗天成二年　①吳大丞相徐溫卒，贈齊王。
（卷276，頁9010。）
②徐知誥爲都督中外諸軍，實掌吳國大權。
（卷276，頁9011。）

929　後唐明宗天成四年　徐知誥專權，欲酖知詢，未果。
（卷276，頁9036。）

931　後唐明宗長興二年　徐知誥治金陵。
（卷277，頁9062～63。）

932　後唐明宗長興三年　徐知誥擴建金陵城周圍二十里，將以貽子孫。
（卷278，頁9076。）

933　後唐明宗長興四年　吳宋齊丘勸徐知誥徙吳王都金陵。知誥乃營造金陵。
（卷278，頁9082。）

934　後唐潞王清泰元年　①正月，徐知誥治私第於金陵。
（卷278，頁9100。）
②知誥思自立爲王。（頁9103。）
③二月，吳王詔知誥還府舍。
④甲申，乙酉，金陵二度大火，知誥疑有變，勒兵自衛。（頁9104。）
⑤徐知詢卒。徐知誥將受禪。（頁9121。）

936　後晉高祖天福元年　①正月，徐知誥始建大元帥府，以幕職分判吏、户、禮、兵、刑、工六部及鹽鐵司。
（卷280，頁9138。）
②高從誨遣使奉牋於徐知誥，勸即帝位。
（卷280，頁9141。）
③十一月，吳王詔齊王徐知誥置百官，以金陵府爲西都。
（卷280，頁9153。）

937　後晉高祖天福二年　①吳太子楊璉納齊王知誥女爲妃。
②徐知誥始建太廟社稷，改金陵爲江寧府。
（卷281，頁9169。）
③徐知誥更名誥，示不與徐氏兄弟同
（卷281，頁9172。）
④五月，徐誥用宋齊丘策，欲結契丹以取中國。契丹亦遣使報之。
（卷281，頁9173。）
⑤吳同平章事王令謀到金陵，勸徐誥受禪，誥讓不受。
（卷281，頁9180。）
⑥七月，吳王楊溥命江夏王楊璿奉璽綬、禪位于齊王徐誥。
（卷281，頁9181。）
⑦十月，齊王徐誥即皇帝位于金陵，改元昇元，國號唐。宮室、乘輿、服御皆如故。宗廟、正朔、徽章、服色悉從吳制。以金陵爲國都，廣陵爲東都。
（卷281，頁9182。）

938　後晉高祖天福三年　①七月，唐太府卿趙可封請唐主復姓李，立唐宗廟。
（卷281，頁9190。）
②十月，吳讓皇楊溥薨。
（卷281，頁9195。）

939　後晉高祖天福四年　①正月，唐主復姓李，立唐宗廟，不上尊號，又不以外戚輔政，宦者不得預事。此皆他國不及之策。
（卷282，頁9197～98。）
②二月，唐主更名昇。附系譜於唐玄宗朝信安王李禕之祖吳王之後。
（卷282，頁9199。）
③四月，唐人遷讓皇楊溥之族人於泰州，賜讓皇子朝服，即日卒。
（卷282，頁9202。）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940　後晉高祖天福五年　二月，唐主婿楊璉謁讓皇楊溥陵，還後大醉，卒於舟中。
（卷282，頁9210。）

941　後晉高祖天福六年　①唐主拒漢主之議共謀取楚以分其地，又拒出兵復唐朝舊疆。
（卷282，頁9221～22。）
②唐主自以專權取吳，尤忌宰相權重。
（卷282，頁9225。）
③唐主勤儉諸例。
（卷282，頁9230。）

942　後晉高祖天福七年　①唐主服金石，性暴烈易怒。
（卷283，頁9244。）
②唐主崩。太子景通即位爲元宗，名璟，後改爲景。改元保大。
（卷283，頁9245。）

943　後晉高祖天福八年　十一月，唐葬光文肅武高皇帝（李昇）於永陵，廟號烈祖。
（卷283，頁9256。）

又、據陳彭年所記，烈祖在臨終時，「嗇元宗指，見血，曰：『北方有事，不可忽也！』」⑬ 後來南唐果然先後被北方的後周和北宋侵凌，終至滅亡。從以上這些事實，更可看出烈祖的謀略之深及見識之透澈。

2. 烈祖的節儉勤政

烈祖的節儉勤政，在五代十國諸君中是相當特殊的。關於這點，陳彭年有一段記載：「烈祖日於勤政殿視政，有言事者，雖徒隸必引見。善惴物情，人不能隱，千里之外，如在目前。」⑭ 而《釣磯立談》中也有如下的記錄：

> 烈祖初得政，盡反知訓之所爲。接御士大夫，曲加禮敬。躬履樸素，屏去浮靡。而又寬刑勤理，孜孜不倦。是時方鎮窺伺，事資彈壓。烈祖視聽不妄，指撝中節。平居自號曰『政事僕射』，高位重爵，推與宿舊。故得上下順從，人無異志。⑮

類似的事，在《資治通鑑》和陸游的《南唐書》中也有記載：

> 唐主性節儉，常躡蒲屨，盥用鐵盎。暑則寢於青葛帷。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，服飾粗略。⑯

陸游又說：

> （烈祖）建國，始即金陵治所爲宮，惟加鴟尾設闌檻而已，終不改作。元宗爲太子，欲得杉木作板障。有司以聞。帝曰：『杉木固有之，但欲作戰艦，以竹作障可也。』⑰

烈祖的樸實無華，清廉勤政，在五代十國諸君中，只有後周太祖（951～954）和北漢劉崇（在位951～954）兩人可以與他比美。⑱ 至於他的英明則和五代其他君主、武將各種駭人聽聞、凶殘暴虐、荒淫無道的行爲形成了强烈的對比。《資治通鑑》中不乏這類的例子，比如閩主的殘忍；楚王的豪奢荒淫；後漢殤帝的驕奢；後晉齊王的奢華淫亂；和南漢主的殘暴等等。⑲ 兩相比較之下，更明白了南唐之所以能成爲五代十國中的一塊樂土，實在不得不歸功於烈祖的英明和他實行仁政的結果。

至於烈祖的仁政，則根本奠基在他的個性和能力之上。除了以上所指他是個重感情又富理智，既長於謀略又具有遠見的武人之外，烈祖也是一個能詩能書的文士。他的文藝修養使他能够禮賢下士，招徠賢者，爲南唐樹立重視文教的典範。以下我們來看烈祖的文藝活動。

---

⑬ 陳彭年，《江南別錄》，頁124。又，烈祖永陵在1950年出土，參見曾昭燏等編，《南唐二陵發掘報告》（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57）。
⑭ 陳彭年，《江南別錄》，頁124。
⑮ 無名氏，《釣磯立談》，頁47。
⑯ 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，冊15，卷282，頁9230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卷1，頁8，所記與此大同小異。
⑰ 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卷1，頁8。
⑱ 有關後周太祖事，參見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，冊15，卷290，頁9454～55；劉崇事，見同書，卷291，頁9500。
⑲ 關於這些實例，參見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，卷282，頁9205～6，9211，9244～6；卷283，頁9240～2，9249，9251，9254～5，9267，9269；卷285，頁9295～6；卷287，頁9376；卷288，頁9409；卷289，頁9449；卷290，頁9458。

臺灣大學藝術 期刊資料庫

3. 烈祖的文藝活動

關於這個問題可以分爲兩方面來看：一是烈祖本身的文藝修養，另一則是他對於文藝的贊助活動。首先我們來看他的文藝修養。根據文獻所載，烈祖本人喜好書法，能作詩，也有收藏。關於他的書法，陳彭年的《江南別錄》中只說他「長善書」；[50] 而龍袞的《江南野史》中也簡略提到：「先祖唯習書，計暇則肄射，所志必精。」[51] 至於他的書法是何種面目，則沒有明言。由於他的書蹟不存，因此無法進一步討論他的書風和藝術成就。但是，由於喜歡書法而收藏古代名作，則是一件自然的事。根據馬令和陸游，烈祖有相當數量的圖書收藏：

> （烈祖）建書樓於別墅，以延四方之士。[52]

> 烈祖以東海王輔吳，作禮賢院，聚圖書萬卷及琴奕游戲之具，以延四方賢士，政事之暇，多與之講評古今……[53]

很明顯的禮賢院是烈祖的圖書館，但它的收藏是否包括書法，不得而知。值得注意的是他另外的建業文房則是收藏書畫的地方。目前臺北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《唐懷素自敘帖》草書卷（777），上面蓋有篆刻「建業文房之印」（圖1），並有南唐兩位官吏的重祿題記：「昇元四年二月日，文房副使銀青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臣邵周重裝」；和「崇英殿副使知崇英院事兼文房官檢校工部尚書臣王□□。」（圖2）[54] 據卷末高士奇的推想，此處的王□□應爲王紹顏。[55] 又依我的看法，王紹顏的題識當在昇元四年

[50] 陳彭年，《江南別錄》，頁123。
[51] 龍袞，《江南野史》，卷1，頁70。
[52] 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1，頁9。
[53] 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列傳卷6，陳覺傳，頁42。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21，頁82之陳覺傳中沒有這段記載。
[54] 見臺北故宮博物院編，《故宮書畫錄》（臺北：故宮博物院，1965），冊1，卷1，頁29。又，關於懷素這卷《自敘帖》是否爲真蹟的問題，參見啟功，〈論懷素《自敘帖》墨迹本〉，《文物》，1983年，12期，頁76～87；何傳馨，〈懷素《自敘帖》在明代之流傳及影響〉，收於《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論文集》（臺北：故宮博物院，1992），頁661～684。
[55] 見《故宮書畫錄》，頁34。

（940）十一月以前完成，因爲崇英殿在西都（金陵），昇元四年十一月庚辰之後便改爲延英殿。[56] 也就是說這卷作品曾於昇元四年（940）之前在崇英殿重裝後，移放到建業文房，加蓋印記，成爲烈祖的珍藏，這是相當明確的史實。傳世的南唐收藏印記有：「內殿圖書」，「建業文房之寶」，「內司文印」，「集賢殿書印」，「集賢院御書印」等。[57] 其中多半，甚或全部，可能都始用於烈祖之時，而就中「內殿圖書」的「內殿」很可能是指凝華內殿而言。[58] 現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韓幹《照夜白》上所鈐的，很可能是這方收藏印（圖3）。像懷素《自敘帖》那樣的名作，日後在中主和後主持續的努力下，累積成數量相當可觀、而品質絕佳的收藏。[59] 後主時曾選擇其中的精品，命徐鉉將它們摹勒上石，分別刻成了著名的南唐法帖：《昇元帖》、《保大帖》、和《澄清堂帖》。這三帖後來並成爲宋太宗在淳化三年（992）敕命王著摹刻的《淳化閣帖》的祖本來源。[60]

烈祖也長於作詩。他傳世最早的作品是他作於九歲時的《詠燈》：「一點分明值千金，開時惟怕冷風侵；主人若也勤挑撥，敢向尊前不盡心。」[61] 這首詩明顯地以燈自喻，期望照料，又明示忠心。據說他的養父徐溫見了讚賞不已。另一首傳說是他作於十歲的《詠竹詩》，其中二句：「栖鳳枝梢猶軟弱，化龍形狀已依稀」，顯示他年紀雖輕，而胸懷大志的氣象。[62]

烈祖在書法和文藝上的嗜好和修養，半因天性，半由他的精進自持所致。回顧他所生長的環境，是武人奪權專政、割地稱王的時代，毫無文藝氣

[56] 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卷1，頁7，昇元四年事。關於王紹顏，參見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，冊15，卷282，頁9230，昇元五年事。
[57] 參見那波利貞，〈五代の文化と書〉，收於神田喜一郎等編，《中國書道全集》（東京：平凡社，1956），卷10，頁32。又，劉道醇，《五代名畫補遺》（臺北：中央圖書館重印，1974），頁5a～5b中列出竹夢松畫上有李璟「合同印」及「集賢院印記」，由此可知烈祖這些收藏印，中主以後仍續用。
[58] 昇元四年凝華內殿前部改爲昇元殿，後部改名雍和殿。見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卷1，頁70。
[59] 陳彭年，《江南別錄》，頁128：「元宗後主皆妙於筆札，好求古跡，官中圖藉萬卷，鍾王墨跡尤多……」
[60] 關於南唐法帖，一般都指《昇元》、《保大》、及《澄清堂》三帖。明人李日華等又標出有《建業文房帖》。但這些帖都已不存在，因此難以論辯。關於諸帖的刊刻，以及它們和淳化閣帖之間的關係，參閱林志鈞，《帖考》（無出版處，1962），頁1～14；15～31，其中有詳細的論述。
[61] 見李調元，《全五代詩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社影印，1984），卷24，頁381。
[62] 這首詩，有人以爲是他的兒子李璟（中主）所作。見李調元，同上註。

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

息。他的養父徐溫「不識書」。[63] 至於楊行密的手下諸將，素質更差。據《釣磯立談》所載：

> 自楊氏奄有江淮，其牧守多武夫悍人，類以威驁相高，平居齋几之間，往往以斬伐爲事。至有位居侯伯，而目不識點畫，手不能捉筆者。[64]

在這種情況下，他能在書法和文藝方面培養出深厚的興趣和創作的能力，可稱異數。

由於烈祖能文能武、英明有儒雅之風、威嚴又能禮賢下士，加上他又有計劃的延攬人才，因此吸引了許多來自各地的文臣武將。根據《釣磯立談》：

> 烈祖以軍功牧昇州，初以文藝自好，招徠儒俊，共論治體，總督廉吏，勤恤民隱。由是，遠邇宅心，以爲己歸……[65]
>
> ……於其所居第旁，創爲延賓亭，以待四方之士。遣人司守關徼，物色北來衣冠，凡形狀奇偉者，必使引見。語有可採，隨即陞用。聽政稍暇，則又延見士類，談宴賦詩，必盡懽而罷。了無上下貴賤之隔。以此二十年間，委曲庶務，無不通知，興利去害，人望日隆。[66]

又、龍袞的《江南野史》也說：

> （烈祖）乃治府署之內，立亭號之曰『延賓』。命宋齊丘爲記，以待多士。……時中原多故，名賢夙德，皆亡身歸順。乃使人於淮上，以厚幣資之。既至。縻以爵祿。故北土士人，響風而至者，殆數千人。羽翼大成，裨佐彌衆。……[67]

此外，烈祖建國後，有鑑於當時各國由於武人專權，吏治敗壞，因此專

[63] 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，冊14，卷266，頁8700。
[64] 無名氏，《釣磯立談》，頁45。
[65] 無名氏，《釣磯立談》，頁45。
[66] 同上註，頁47。
[67] 龍袞，《江南野史》，卷1，頁72。

意任用儒臣行政。《全唐文》中，收有他的一篇〈舉用儒吏詔〉，可爲證明：

> 前朝失御、强梗崛起，大者帝，小者王，不以兵戈，利勢弗成，不以殺戮，威武弗行，民受其弊，蓋有年也。或有意於息民者，尚以武人用事，不能宣流德化，其宿學巨儒，察民之故者，嵁嚴之下，往往有之。彼無路光亨，而進以拊傴爲嫌，還以清寧爲樂。則上下之情將何以通？簡易之政將何所議乎？昔漢世祖數年之間，被堅執銳，提戈斬馘，一日宴然。而兵革之事，雖父子之親，不以一言及之。則兵爲民患，其來尚矣！今唐祚中興，與漢頗同。而眇眇之身，坐制元元之上，思所以舉而錯之者，煢煢在疚，罔有所發、三事大夫，可不務乎？自今宜舉用儒者，以補不逮。[68]

又，我們根據馬令和陸游的《南唐書》諸列傳資料，歸納得知當時來歸江南的人，最多是來自江北，包括山東、河南、陝西和山西；此外也有四川、福建、和廣東地區的人。來自山東的譬如潘處常，史虛白，劉彥貞，高越，盧文進，孫忌，韓熙載，潘佑和李廷珪父子；來自河南的包括王彥倚，朱元，李平，張延翰；來自陝西的有常夢錫；來自山西的有張易；來自四川的有陳曙；來自福建的有陳貺，江文蔚，游簡言；而來自廣東的則有陳陶等人。[69]

那麼烈祖對於這些人才的取捨，和文藝活動的態度又如何呢？以我的觀察，他是以實用爲原則：文藝的活動隸屬於政治的利益之下。我們從下面一些例子中便可以很清楚的看出這個特點。那些來歸的文武人才多半經過烈祖的嚴格挑選。凡是做事認真，敢直言極諫的，他必給予獎賞，譬如《全唐文》中便收了他的一篇〈旌張義方直言詔〉：

> 孤始任義方以風憲，乃能振朝綱。辭皆讜切，可宣示朝野。賜義方衣一襲，以旌直言。[70]

而凡是個性放浪不羈的，縱有文才，他也不予重用，頂多安置一個小職務，譬如才氣縱橫、大名鼎鼎的韓熙載便是一個例子。韓從剛剛來歸（926）開

[68] 見《全唐文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影印1814年版），冊3，卷128，頁1612。
[69] 參見馬令和陸游的《南唐書》中這些人物的個別傳記。

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

始，甚至歷經烈祖一朝，始終都不得高位，因而悒鬱不得志。[71] 而有些人在不被烈祖引用後，便隱居起來，如史虛白等人。[72] 又，《釣磯立談》的作者和他的父親也是如此。在該書序文中他明白的說：「叟山東一無聞人也，清泰（934～36）年中，隨先校書避地江表，始營釣磯於江渚……」[73] 這些四方來集的文人儒士，不論是否效命朝廷，或隱居山林，都和當地的人才共同匯集成重要的文化資源，造就南唐文風鼎盛的局面。

烈祖由於自己喜好文藝，因此也經常與屬下的文臣儒士聚會宴飲，並趁興作詩。由於他的個性猜忌，因此當他發現如果有人敢在字裡行間寓意頂撞之時，便毫不猶疑地予以懲罰。李調元的《全五代詩》中有如下的例子：

> 初、李昇蓄異志，欲有江南。雪天會群僚。宋齊邱、徐融等出。令借雪取古人名以諷之。惟齊邱稱旨。融意欲挫昇。昇大怒，收而投之江。昇曰：『雪下紛紛便是白起。』齊邱曰：『著履過街必須雍齒。』融曰：『明朝日出爭奈蕭何！』[74]

藝術如非爲政治服務，則他絕不能接受。當他自還在打天下時，便曾說「兵民困苦，吾安可獨樂？」因而「縱遣侍妓，取樂器焚之」。[75] 又當中主還是齊王的時候，有一天，「烈祖幸齊王宮，遇其親理樂器，大怒，切責數日。」[76] 他發怒的原因並不在於反對音樂本身，因爲他自己便曾爲了伶人申漸高擅長音樂，而提拔他當教坊部長的要職。[77] 顯然，他認爲將爲人君的齊王應當關心國事，或從事較實際的藝術活動，比如書法與詩文，而非「親理樂器」這種無用之事。的確，在他的督導下，他的諸子也都能詩文和

[70] 同註[68]

[71] 韓熙載傳，參見徐鉉，〈唐故中書侍郎光政殿學士承旨昌黎韓公墓誌銘〉，《騎省集》，卷16，頁122～124；又見馬令《南唐書》，卷13，頁56～57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卷9，頁55～56。

[72] 參見馬令和陸游的《南唐書》，隱者傳部份。

[73] 無名氏，《釣磯立談》，序文，頁45。

[74] 李調元，《全五代詩》，卷24，頁381。

[75] 見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，冊15，卷278，頁9089～90。

[76] 陳彭年，《江南別錄》，頁124。

[77] 申漸高傳見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25，〈談諧傳〉，頁98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列傳卷14，〈雜藝方士〉，頁79～80。

書法。[78] 中主的書法學羊欣，而後主學柳公權，兩人並擅長詩詞。[79] 這當然也是受到烈祖的影響。

總之，烈祖對於文藝的取捨是偏好實用而排斥非實用性的藝術。這與他的生長背景有極大的關係。由於他早年生活的困頓艱辛，養成他重事功而輕享樂的個性。在政治上他儉樸勤政，在取才方面他重實幹而輕風流，在文藝上他則偏好書法、詩詞與收藏。這種種務實的作風共同營造了南唐初期國勢的豐實與鼎盛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[78] 參見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7，〈宗室傳〉，頁33～36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列傳卷13，〈烈祖諸子〉，頁74～76。

[79] 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列傳卷13，頁74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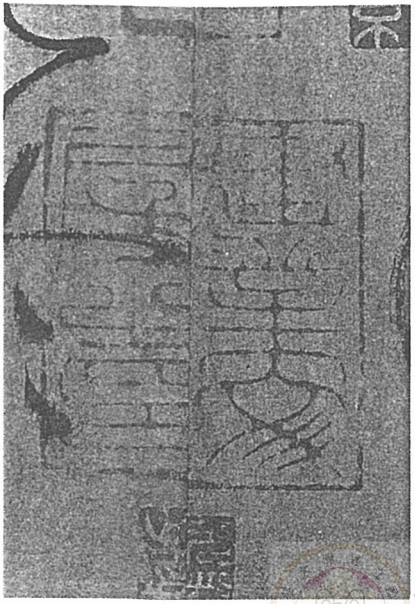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



圖2

臺灣大學圖書館
期刊資料庫



圖3

圖1 「建業文房之印」 採自唐 懷素
《草書自敘帖》 777 臺北故宮博物院

圖2 「南唐邵周和王（紹頴）重裝題記
昇元四年（940） 採自唐 懷素
《草書自敘帖》 777 臺北故宮博物院

圖3 「內殿（？）圖書」印記 採自唐 韓幹
《照夜白》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, New York